

# 摒弃黑白思维，中欧关系有望春暖花开

自去年11月德国总理朔尔茨和12月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相继访华，中欧关系出现修复迹象后，近期中欧又迎来了一波密集的互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已于29日率先启程访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表态将于下周访问中国，而据德媒报道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也寻求于4月中旬访华。这一轮外交高潮能否助推中欧关系止跌回升，甚至迎来春暖花开呢？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行前在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和墨卡托中国研究所两大智库组织的讨论会上发表的对中欧关系未来看法演讲，受到各界的关注。这个演讲既被认为是她作为“欧盟主管”就中欧关系发表的首次全面讲话，也被认为是为接下来的访华之旅放风定调。

在开头强调“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关系之一”、结尾又表示“中国是历史、进步和挑战的

迷人而复杂的结合体”的论述中，冯德莱恩释放了可谓既新又旧、既清晰又矛盾的信号。她重复了此前一直强调的中国在俄乌冲突中的表现“将是未来中欧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充满华盛顿口吻的“中国寻求一种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论调，但又强调中欧关系不是非黑即白的，与中国的故事不需要是一个防御性的故事；她清晰地表示与中国脱钩既不可行，也不符合欧洲的利益，但又强调包含了不少保护主义色彩的所谓经济“去风险化”战略。

从这个演讲中，我们看到了一段时间以来欧洲对华政策辩论中各种“对华天真论”“降低对华依赖论”“中国在俄乌冲突中特殊责任论”“强调中欧意识形态差异论”或深或浅的影子，也反映出欧洲的对华政策目前仍然处于争论当中。不过，与其从中寻找中欧之间差异或者矛盾的问题清单，并拿着这个清单

去给中欧关系下诊断，不如承认，冯德莱恩演讲中反映出来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共识是，欧洲“不能失去中国”，欧洲应该继续保持与中国接触。

应该说，这是继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称欧洲必须有自主立场、暗示不能无条件站在美国一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欧盟不会效仿美国对中国采取的严厉政策之后，欧盟领导人试图在大国关系变局中给欧盟找定位的一个最新努力。毋庸讳言，当前欧盟对华政策有其矛盾和纠结之处，但希望保留独立于美国之外的对华合作余地无疑是各界的共识。

这为理性务实的态度回归欧洲对华政策创造了一定的认识基础。实际上，不管近几年中欧政治、外交关系如何起伏波折，中国在欧盟所追求的繁荣增长前景上发挥的作用有增无减。且不说中国在2020年和2021年连续两年保持欧盟

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欧贸易连年来持续增长、平均每天超20亿欧元进出口额的事实，就从俄乌冲突后美国大量吸走欧洲本土制造业、硅谷银行危机波及欧洲影响金融稳定中，欧盟也应该认识得更加清楚了。

著名学者马凯硕曾经给欧洲提出过一个建议，希望欧洲能够学习东南亚的做法，反复提醒美方：不要逼我们站队，我们有更重要的问题要解决。其实，清楚自身的利益所在、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之后，该怎么对待与中国的合作，相信不难回答。中欧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这个基本面才是欧洲“战略自主”应该有的认知内容。

友好是中国对欧政策的主基调，合作是中国对欧政策的总目标，这一态度中方已经多次向欧方表明。对于欧方领导人的来访，中方当然张开手臂欢迎，也愿意进行务实对话沟通，但中欧关系的春暖花开需要双方的相向而行。▲



## 司法改革危机加剧以美分歧

丁隆

因司法改革引发的抗议浪潮演变为以色列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之后，内塔尼亚胡政府被迫宣布暂时推迟这一改革。但这场风波令人意外地连带冲击到了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拜登总统及其团队多次发声，严厉批评内塔尼亚胡的改革计划，要求其放弃改革。内塔尼亚胡及部分极右翼阁员则对美国反唇相讥，声称“以色列不是星条旗上的另一颗星”，强调以内政不容干涉。

众所周知，美以是亲密盟友。以色列能在中东生存发展，与美国的坚定支持密不可分。两国国内政治也密切联动，美国犹太人群体是连接两国政治的纽带。这次司法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中就包括与美国犹太财团联系密切的以色列智库。司法改革的支持者还认为改革是借鉴美国“先进”经验。美国很少这样公开干涉盟友的内政，美以之间的矛盾以往多私下解决。这次的反常事态显示美以关系出现了明显裂痕。以色列国内甚至出现“美国正在以色列发动颜色革命，帮助伊朗颠覆以色列”等激烈言论。美以关系近来陷入紧张，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以关系具有较强的党派色彩。盖洛普最新民调结果显示，85%的共和党人对以色列表示赞赏，民主党人中的这一比例为64%。80%的共和党人对以色列人的同情多于巴勒斯坦人。66%的民主党人对以色列持积极态度，但2/3的民主党人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一般而言，美国共和党与以色列右翼在宗教、意识形态和对巴勒斯坦人政策等方面立场相近。共和党执政期间，美以关系较融洽。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几乎一边倒地偏袒以色列，除了将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推出有利于以方的巴以和平“世纪协议”，还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民主党政府却往往不能与以色列右翼政府同频共振。在奥巴马时期，美方对安理会关于谴责以方建设定居点的议案投下弃权票，予以放行。以色列对奥巴马政府与伊朗达成核协议非常不满。因此，当拜登政府遇到当前的以色列右翼政府，矛盾便难以避免了。

其次，拜登政府用价值外交处理美以关系。在拜登政府看来，内塔尼亚胡政府拟推行的司法改革是“以民主之名反民主”。美方指责这个改革表面上旨在减少司

法对政府日常工作的干扰，提高行政效率，实则是内塔尼亚胡政府企图垄断权力。以色列被美国视为“中东民主堡垒”，与其他中东盟友相比，美国更加珍视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相似的以色列之间的盟友关系。作为价值观外交的重要举措，拜登政府近期正举办第二届所谓“民主峰会”。此时以色列出现“民主倒退”，拜登政府自然不想坐视不管，内塔尼亚胡不被邀请参会也是情理之中。

再次，巴勒斯坦问题上双方分歧明显。拜登政府延续了民主党在巴以之间维持相对平衡的一贯政策，这体现在不放弃“两国方案”，对巴勒斯坦人持同情态度，反对以色列将巴领土上的非法定居点合法化的意图。内塔尼亚胡上台后，以色列开始推动兼并约旦河西岸北部四个犹太定居点，这一既违反以色列国内法又不符合国际法的行为，遭到拜登政府抵制。内塔尼亚胡政府中多位重要内阁成员，最近多次发表激进言论试图推翻“两国方案”，这也

引起美国民主党人士的警觉。近年来，民主党内部出现一支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力量。以桑德斯、沃伦等民主党重量级人物为代表的20多位议员，公开抵制以色列，主张反思美国的巴以政策，维护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民主党内部反以力量崛起，虽不利于美以关系，但有利于加强国际社会支持“两国方案”的正义力量。

最后，以色列内乱不符合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布局利益。随着沙特与伊朗实现和解，中东地区掀起一波强劲的“和解潮”，美国和以色列的“敌手”伊朗和叙利亚的地缘政治环境明显改善。中东地缘政治的快速分化组合显然不利于美国，意味着美国拉拢阿拉伯国家组建反伊朗联盟的企图落空，其在中东势力被认为正在衰落。内塔尼亚胡政府在此时激化国内矛盾、挑动巴以冲突，将使美国更加被动。因此，美方坚决要求内塔尼亚胡政府撤回改革方案，停止兼并定居点。

虽然美以关系出现裂痕，但远未伤及双方盟友关系的根本，对此不宜过度解读。在遏制伊朗等问题上，两国仍拥有许多共同利益。这也是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司法改革问题上做出妥协的原因之一。当前美以关系陷入紧张，不过是两国国内政党轮替导致的峰谷交错趋势的进一步强化，并不代表美以同盟关系的根本性转向。▲（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进入2023年以来，菲律宾对外军事和安全合作呈现活跃状态，频度和密度较以往都有明显提升。根据菲律宾军方已经公布的消息，菲美年度“肩并肩”军演将于4月在菲律宾举行，届时至少有约1.7万名美国和菲律宾士兵参演，规模可谓空前。在此之前，菲美已经宣布同意扩大2014年《加强防务合作协议》，菲方将多开放4个基地给美军使用，使美军在菲基地总数增至9个。加上菲方称正考虑与日本签署《访问部队协议》以及最新透露的将在4月份建立菲美三方安全防务磋商机制，菲律宾的一系列军事安全动向引发广泛关注，也让人怀疑菲律宾的国家安全感知是否出现错位。

根据2020年的一项世界军事能力排名，在老“东盟十国”中，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排在印尼、越南、泰国、缅甸、马来西亚之后居第六位，

## 菲律宾应提防“安全感知”错位

代帆

稍微强于柬埔寨和老挝等国。实际上，通过军事现代化增强武装部队防御能力，是上世纪90年代尤其南海争端浮出水面以来，历届菲律宾政府孜孜以求的政策重点。但问题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菲律宾一直自感没有余力单靠自身完成军事现代化。

举例来说，早在1992年，菲律宾政府就为海军现代化拨款6亿比索，但次年该预算就被削减至5.04亿比索，到了1994年菲海军实际没有获得任何拨款。1995年菲律宾开始推动《菲律宾武装部队现代化》的实施，开启长达15年的军事现代化计划，但直到1996年12月，菲律宾国会才批准第一阶段预算拨款。之后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菲律宾比索贬值近四成，导致菲军方得到的首批78亿比索资金由原来的3.12亿美元贬值为1.95亿美元，菲武装部队的采购计划无法正常进行。后来由于菲律宾经济遭受金融危机重创，菲国会干脆拒绝继续为该计划提供资金，其军事现代化的计划不得不再次停滞。

在阿基诺三世时期，以所谓应对来自南海的“安全挑战”为由，菲律宾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国购买大批二手武器。2018年，杜特尔特总统也通过5.6亿美元的五年军事现

代化计划。但对长期积弱的菲律宾武装部队而言，这些军事投入只能是维持基本运转，远谈不上“现代化”。

为此，加强与外部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军事和安全合作，逐渐成为菲律宾提升自身军力的一大“仰仗”，而美国确实也成为菲律宾最大的军事援助来源。2015财年以来，美国国务院为菲提供了高达4.63亿美元的军事安全援助。而自2018年以来，美国国防部还额外为菲律宾提供了2.37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更不用说，还有来自澳大利亚、日本等美国“小伙伴”的援助。

那么，这些钱主要用在了哪？自1946年独立以来，菲律宾长期面临南部棉兰老岛分离主义以及阿布沙耶夫组织挑战。这些成为菲律宾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也决定了当时菲律宾政府在“安全感知”方面探知的威胁主要来自国家内部。无论菲律宾的军事现代化还是美国对菲律宾的军事

援助，之前都以平定这些内部叛乱为主要方向。但自阿基诺三世政府将“海洋安全”作为国家安全战略重点以来，菲律宾的军事现代化也开始尤其着重于提升海空防御能力，以应对来自海洋方面的所谓“挑战”。自小马科斯总统上台后，无论军事现代化还是对外军事安全合作，海洋防御能力建设以及海洋安全再次得到凸显。菲律宾一方面称“南海问题的未来不应由外部势力决定”，另一方面却围绕海洋安全大力发展与外部大国的合作。

考虑到菲律宾仍然孱弱的军事能力，其提升军事现代化水平的政策逻辑本无可厚非。但菲律宾越来越将海洋作为国家安全重点，并以此方向推进与域外大国的军事和安全合作，无疑引发了地区安全的外部干预问题，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潜在风险。在笔者看来，菲律宾近期在军事和安全方面的举措已经偏离其最初立场和出发点，与其他南海争议题国如马来西亚和越南相比，菲律宾在安全上进一步与域外大国绑定，这实在是其国家“安全感知”上的偏差越来越大，其结果往往不是能够独善其身，反而是与自身防务和安全能力的追求南辕北辙。▲（作者是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菲律宾研究中心主任）